

钟艳家境贫寒,貌不惊人,在同事眼里是“杂草”和“异类”——因为她做幼儿园老师6年来,从没收过家长的任何礼物。最近的一次,她不仅退还教师节收到的购物卡,还附上一封亲笔信。正是这封信,让人们认识了这位“人品第一位”的老师——

对教师节礼物说不

本报记者 秦珍子

点评

付雁南

李某:越界



无论从哪个角度,这个深圳男人都是个绝对的好人。他在单位为人热情,工作勤快,当过保安分队长,闲暇时间,他还是深圳的“快乐义工”,参加过不少志愿服务。

可在媒体公布的照片里,这个热心、善良的男人,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他穿着一件黄色的T恤,伸出左脚,用力踢着面前的警察防暴车。

在一周前的反日游行中,他带着“拼命保卫国家领土”的念头,扛着国旗,喊了一天“抵制日货”、“还我钓鱼岛”、“祖国万岁”的口号,晚上回家累得趴下就睡着了。要不是警方公布的“通缉照片”,他几乎忘了,在激动的情绪中,他曾经抄起一根木棍,砸坏了警车的后视镜。

如今,这个“从没做过任何违法事情”的男人只能在警察局里捂着脸流泪。从激昂的爱国者到狂热的暴徒,两者的界限是那么模糊,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林国俊:心中有债

从付不起给儿子治病的医药费、偷偷离开医院那天起,林国俊的心里就埋下了个事儿。

他再没去过那家医院,平日总想着报医院的“滴水之恩”。忐忑的日子过了49年,直到上周,他终于和老伴儿一起,亲手把3万元现金还给了医院。

“债还了,没遗憾了。”他说。

面对记者,他总忍不住絮絮叨叨地解释,当年看病的时候,家里穷,跟亲戚也借不来钱;这几年也好几次想来还钱,可总想多攒点,不然“说不过去”。

事实上,一开始的时候,连医院也一度把他打来要求还钱的电话当恶作剧。因为那个让他49年持续内疚不安的数字,是18元。

李娜:被“汉奸”

对于李娜而言,即将在大东京举行的“泛太平洋网球赛”意义重大。它不仅决定了李娜的世界排名、决定了她能否参加年终总决赛,而且还决定了她是不是“汉奸”。

至少在很多愤怒的网友看来是这样的。李娜决定赴日参赛的消息一出,有人打算焚烧她的自传海报,还有人言之凿凿地盖棺定论:早就听说李娜是“汉奸”,果然。

连支持她参赛的观点,听起来也和体育没什么关系:“在这个时候击败几个日本选手,让五星红球飘荡在日本上空,那才叫真爱国。”也许对于李娜而言,在赛前听到这些话未必是坏事。至少,和这些复杂的争论一比,网球场上的战术拼抢,真是简单太多了。

朴槿惠:道歉

作为一个女儿,朴槿惠有很多关于父亲的美好记忆。她和曾任韩国总统的父亲朴正熙一起住在青瓦台,在母亲遇刺身亡后,她又出面陪同父亲参加外交活动。这种联系是如此紧密,以至于40年后的今天,还有议员因为她“父亲的长相”而出面抗议。

但她现在选择为父亲道歉。1965年,朴正熙通过政变夺取韩国政权。1974年,他镇压学生反独裁集会,处死8人。如今,半个世纪过去,已成为韩国总统候选人的朴槿惠面向媒体鞠躬,“深深向所有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受伤害的个人以及受害者家属道歉”。

有人评论说,朴槿惠正在摆脱“父亲的阴影”。此前她曾经坚持,父亲所作所为是“历史的必然选择”;而现在她说,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,她需要与普通民众分享自己对国家那段历史的看法。

如同你所看到的,如今的她,首先是个回归常识的政客,其次才是一个女儿。

迪迪一边大喊“要开飞机喽”,一边伸出圆滚滚的胳膊,从小床上铺扑进钟艳怀里。

这个4岁的小女孩自今年9月幼儿园开学后,早就习惯了午休后这样起床,她已经非常信任钟艳了,无论是学会叠被子或是和小朋友吵架,总会第一时间呼唤“钟老师”。

不过,小女孩并不知道,自己曾在老师和妈妈之间传递过一个秘密,而妈妈则向互联网公布了这个秘密:钟老师会对家长的礼物说不。

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一早,钟艳像往常一样在上海爱绿幼儿园门口迎接小朋友。迪迪来得有点迟,送她的外公特意拍了拍她粉红色的小书包,叮嘱钟艳:“孩子和她妈妈给老师们准备了贺卡,您一定要收下。”

钟艳一下子就听出来,“老人家话里有话”。在安顿好孩子之后,她打开迪迪的书包,找到3个黄色的信封。在给班级3位老师的贺卡内,都夹着超市购物卡。

事实上,从教6年,曾在3个幼儿园做过老师的钟艳经常面对这样的场景。她稍微思考了一下,很快作出处理决定:利用上午空余时间给迪迪妈妈写一封信,并让搭班的两位老师共同签字,归还购物卡。

在钟艳看来,迪迪是转学生,家长想让她多照顾一些可以理解。由于和迪迪妈妈还并不熟悉,所以直接退还礼物显得生硬,更可能引起家长的误会,“是不是嫌少?”、“是不是侮辱了老师?”她觉得,“亲笔信”是最真诚的方式。

趴在办公桌上,钟艳一笔一画地写道:“收到您和孩子精心制作的贺卡,我们很开心……但里面的购物卡我们不能收。”她特意写上了“我们”,因为“班级是一个整体”。

这封后来被迪迪妈妈贴到网上的信,字迹非常工整,看不到一丝涂改的痕迹。“因为都是心里话”,钟艳一气呵成,她又找到另外两位老师,请她们也签下了名字。

“从我毕业那天开始,我就发誓要做一个好老师,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坚持。”28岁的钟艳表示自己这6年来从未收过家长的任何礼物。从前大部分礼品她都会当面谢绝,后来感觉到其他老师的不满,她只好用“兜圈子”的方式,先收下,再偷偷“写封信”归还。

其实,钟艳很早便意识到自己是个异类。有的同事让她收下礼物,“管他的”。有的同事劝她:“你做的事没错,但现实就是这样,你一个人站出来一点好处也没有。”甚至有同事不满她就误了大家的“福利”,背着她狠狠抱怨。

尽管钟艳不相信“世上没有一处纯洁的地方”,但她还是时常感到孤独。她从不参与“说闲话”,因为“那不是我的语言”。有人劝她奉承欣赏她的领导,她会直接拒绝,虽然“这种风就此刻刹住”,却也得罪了同事。

有一次,一位搭班的保育员故意为难她,“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搬椅子的工作交给小朋友去做。钟艳担心孩子们会受伤,便独

影响

我为什么当记者

李斐然

我上学那会儿,凡事都要表个态。比如进了新闻学院的门,头一件事就得说清楚:你想做什么样的记者?

呃,这问题让我一愣,半天没言语。这一犹豫不要紧,气得我的导师直哆嗦。他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冲进战区的中国记者,连防弹衣都没穿好,就奔赴巴格达了。任何没有立刻振臂高呼“我要做好记者”的反应,都不是他要的正确答案。

于是,这个问题一直猫在我的心里。两年前的冬天,我一个人跑去政局动荡的中东,那时候的埃及蔓延着一场因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引起的骚乱。在距离时代最远的地方,我成了一个实习记者,揣着采访本和录音笔,一边采访新闻稿,一边继续寻找答案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咬到一块回形针,迷人和恐惧的夹层饼干。我常常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外面看,抬头是波光粼粼的尼罗河,对岸的古老金字塔巍然不动,低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,坐着坦克在楼下来回巡逻。挥舞着拳头的示威者砸了马路对面的超市和花店,他们高声呼喊着口号离开,地上只剩下被砸碎的玻璃,打翻的牛奶和踩压的鲜花。

敲击键盘的打字声和着不远处枪声,混杂在刺鼻的催泪瓦斯味道里面,构成一出别致的交响乐。那时候网络中断,电话也没有信号,混乱中我接到的第一个讯息,来自我的战地记者导师。在海事卫星电话的另一端,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依然充满期望:“你不要害怕,要勇敢地冲到前线,做个好记者。”

可是不好意思,我还是被恐惧打倒了。就在我写稿的时候,拿着枪的一队大兵大摇大摆地冲向办公室,嚷着要撞开房门,楼道里回荡着他们的吼声。当时我的手无力地瘫在键盘上,对着刚写了标题的稿件总也想不出新闻导语。我心里的打字



钟艳和小朋友在一起

力完成。“别人可以转身就走,但我丢不下。”她说。

即便在工作之外,钟艳也会让自己“多承担一些”。在爱绿幼儿园为单身女工提供的租屋内,她是名副其实的“楼长”,总是主动打扫卫生,还把水电费用为大家算得清清楚楚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大,宿舍楼上楼下经常人数不一致。为了均摊房租,“谁也不觉得吃亏”,她就经常换着住,抱着被子上下穿梭。

只有了解钟艳真实情况的同事才知道,她不是不花钱。母亲患有癌症,上大学又欠了几万元债,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没让自己奢侈过一次。除了公摊费用,在上海浦东工作生活的她每月只花两三百元。一般每月10日发工资,11日她就准备钱还账。

在同事们看来,钟艳是一棵名副其实的“杂草”,貌不惊人,生命力却很顽强。她从不化妆,也很少买新衣服。“猛一看小钟,其貌不扬,她需要人去细品。”曾经的一位领导这样形容她。

作为80后,“杂草”钟艳一点也不“潮”,她从不关心“时尚”,对“八卦”更是完全不感兴趣。业余时间,她读书、写文章、关注时事政治。在上大学的时候,她便是班上连年的一等奖学金获得者。

“虽然我条件差,但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,内心充实而有意。”当被问及为何不收下家长的礼品改善生活时,钟艳表示。

不过从不接受礼物的钟艳也会“送礼”。对大学时告诫自己“当一天老师,就要

负责到底”的恩师,她曾组织全班同学“翘课”悼念老师的父亲,逢年过节,她从没忘记打一通电话,发一个短信。

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,这个省吃俭用的姑娘立即捐出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在开幼教研讨会时遇到最新的儿童玩具和教具,她也会自费给孩子们买回来。

1984年农历8月15日是钟艳的生日,这一天也是公历9月10日,中国第一个教师节。钟艳有时会感慨,“这可能就是一种注定”。工作后的每年生日,她最开心的事便是收到小朋友亲手绘制的贺卡,上面画着小花小草小圆圈,还有钟老师带着小朋友,“这就足够了”。

钟艳说起自己带的第一班小朋友,还



机倒是噼里啪啦打出一串串的念头:谁知道记者该啥样,反正我做不了。

就在我暗下决心等毕业找个新工作的时候,办公室来了位小客人,跟着记者父母驻外的6岁小男孩米乐。这个中国男孩平时不爱说话,给他糖吃的时候就会红着脸摇头。他凑到我身边,小声地问:“刚才你害怕吗?”

又是这个问题。我绘声绘色地跟他描述当时的情形,那些大兵是如何大吼大叫地冲上楼来,我们用桌椅堵住的大门是如何被他们坚硬的枪托砸得咣咣直响。

小家伙默默地听我说着,就在我夸张地比划着当时有多可怕的时候,他突然用手拉着我的手,说:“我也有点害怕,可是你别害怕,下次再这样,我来帮你。”

这话一下子击中了我。这可是个平地里连小狗都害怕的小家伙,而他现在要把他仅有的一点勇气送给我。他也不知道,路上站满大兵,背着枪并不是玩具,那条他平时蹦蹦跳跳就能通往幼儿园的路,现在要屏住呼吸悄悄走过。即便如此,他还鼓励别人,不要害怕。

面对危险,米乐有他自己的对策。他白天拿着玩具望远镜,站到阳台上为其他正在工作的记者“站岗”,晚上他总是睡不着觉,“咱们得有一个人醒着盯着啊”。

米乐不会写稿子,他每天最大的创作就是画画,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,米乐依然涂涂画画,记录着他的愿望。他专门画画,送给即将飞往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的

能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和样貌。她把孩子们从托班带到大班,整整4年。毕业典礼上,她还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发表了一篇演讲。

站在舞台上,灯光照着钟艳的脸。她始终微笑着,祝福孩子们“珍重未来”。而对自己来说,“所有的心酸都在心里”——拿着微薄的薪水,付出巨大的努力。有时,她会躺在床上,在夜幕的笼罩中问自己,“这条路选对了吗?”

孩子们的反应是给钟老师最好的答案。班上的一个女孩长得瘦小,钟艳总是亲手给她喂饭。有一次,小女孩认真地睁大眼睛对她:“钟老师,等你老了我也给你喂饭,还给你买大轮椅!”还有一个小男孩直接对她表白:“钟老师,你会结婚吗?等我长大了,我们就结婚吧!”

而转学还不满一个月的迪迪如今已经对钟艳非常依恋。有时候她正在玩儿游戏,会突然想到钟老师,跑过来亲她一口。

“有一天,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一张张稚气天真的笑脸时,你会拿什么去给那些可爱的孩子。”大二时,钟艳在一篇散文中写道,她让孩子们带一本好书来上幼儿园,学会“分享”。也会在某个孩子打不还手时鼓励他,学会“宽容”。中班的孩子们有时会撒小谎,钟艳会直接拆穿,教他们学会“诚实”。有同事悄悄跟她打招呼,“某个小朋友是教育局领导介绍过来的”,她只会笑笑,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

在钟艳看来,家长们不论富贵贫穷,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她有时甚至会“偏心”条件差一点的或是转学区过来的孩子。

当看到有些幼儿园老师因为家长不送礼物而让孩子挨打、挨饿时,钟艳会直接表达她的愤怒。“这样的行为根本不适合在教育岗位上。”她说,“只有自己做到一个‘人’字,才有资格去陪伴小朋友长大成人。”

1984年农历8月15日是钟艳的生日,这一天也是公历9月10日,中国第一个教师节。钟艳有时会感慨,“这可能就是一种注定”。工作后的每年生日,她最开心的事便是收到小朋友亲手绘制的贺卡,上面画着小花小草小圆圈,还有钟老师带着小朋友,“这就足够了”。

钟艳曾对家长们说,正因为孩子小不懂事,才能把“送礼”这种负面行为放进他们的书包。但对于和自己同一签字的同事,她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担忧。“她们被我拖进了这场风波里,我希望新的新闻出来,很快覆盖掉旧的,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。”

9月18日上午,钟艳照例在孩子们吃完点心后给他们讲10分钟的“小课堂”。那天她讲的内容不是“讲卫生”或是“懂礼貌”,而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钓鱼岛历史”。

一个小学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喊:“打日本!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世说新语

苹果是从私家破车库里走出来的美国英雄。高铁是中国的英雄,它的车库姓公。

“搞,死劲搞”

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持续的。”

“搞,死劲搞,只要不发财。”

前一句话,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投入刺激经济的担忧,后一句话,是一个基层官员对一财经记者说今年工作的体会。

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,吴敬琏指出:据不完全统计,为了稳增长,各地作出的投资规划,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。稍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,都会认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,这套做法的消极后果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,存在的问题已经相当危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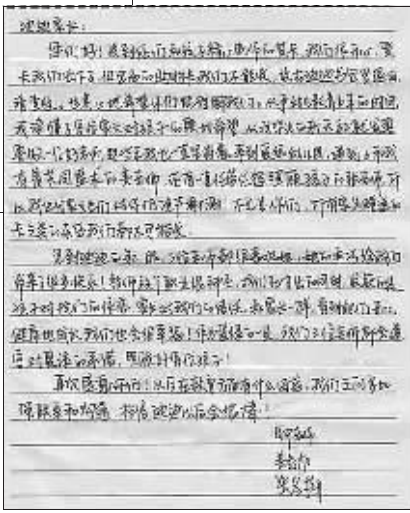
吴敬琏特别谈到高铁:高铁是不是需要发展?是需要的……可是,用这么多资源进行普遍建设,留下来两万亿元的负债,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?现在对付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,仍然是应用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,用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进行大规模投入。

似乎是为了印证吴敬琏的担忧,9月5日一天,国家发改委网站先是公布25个轨道交通、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规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的信息,继而又批准或批复了13条公路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。这些轨道交通项目涉及18个城市、8000多亿元总投资,13个公路项目总里程超过2000公里。同一天,发改委还批复了9个污水处理项目、1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7个码头港航项目。此次涉及的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达上万亿元。

这些项目有中央政府投资,但更多的要地方配套投资。经济学家陈季冰比吴敬琏乐观,他说:地方政府落实地方版4万亿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,他们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做到的,这可能只是一种愿景、一个规划。

陈季冰认为,学术界和媒体都担心,一旦地方政府重启大规模投资,在短暂的刺激过后,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,产能过剩、大量烂尾工程、地方债务危机、银行坏账剧增等恶果将难以避免。全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早已欠下一屁股债,在当下不明朗的形势下,对那些资产负债率很高的政府项目,银行不会考虑借贷。最近几个月来,全国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始终保持在低于市场预期,中长期的信贷增长规模尤其偏低,都显示了银行谨慎观望的心态。

但陈季冰说的是理论,而透支财富,是所有中外政府的天性,必会死命要气得哆嗦了。



钟艳写给家长的信

为了教孩子们好好学习英语,钟艳自称是火星人,“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和钟老师到火星上去,和火星小朋友一起玩。”当被孩子们问到火星上有什么时,她形容那里有一座美丽的幼儿园,里面开满花朵,老师带着小朋友一起快乐地做游戏。

“每个人都在默默做事,不用送礼,不用奉承领导。”那也是钟艳自己的梦想,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幼儿园,每个孩子、每个家长都得到真诚、公平、友善的对待。

曾经有亲戚给这个姑娘介绍对象,因为不想别人分担自己的经济重担,钟艳都拒绝了。她心里非常清楚,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,还要奋斗很多年。但她不愿意走任何捷径,更不愿意接受物质帮助。在她心里,“做老师不在于技能有多高,品格才是第一位的。”

钟艳曾对家长们说,正因为孩子小不懂事,才能把“送礼”这种负面行为放进他们的书包。但对于和自己同一签字的同事,她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担忧。“她们被我拖进了这场风波里,我希望新的新闻出来,很快覆盖掉旧的,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。”

9月18日上午,钟艳照例在孩子们吃完点心后给他们讲10分钟的“小课堂”。那天她讲的内容不是“讲卫生”或是“懂礼貌”,而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钓鱼岛历史”。

一个小学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喊:“打日本!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

钟艳微笑着回答他:“打仗会伤害中国和日本的小朋友,和平才是我们永远的需要。”